

教會的權威—— 核心問題與附屬問題

編者按：David Stagaman 是美國加州栢克萊耶
蘇會神學院神學部主任。

David Stagaman
區華勝譯

在Lahuaymarca 鄉村本已有一位教堂管理員，他是印第安人。在鄉村的慶日上，由鄰近地方來了一位神父，為該鄉村舉行彌撒。那位神父不喜歡印第安管理員，迫使另一位混血兒代行其職務。神父對這位混血兒說：「那位印第安人什麼都不懂；他像鸚鵡一樣拾人牙慧，真不像基督徒。你是歐美印第安混血兒，也是琴師，並懂拉丁文，若你能夠協助彌撒，則會更佳！」

這位混血兒回答說：「神父，我很難過，心中充滿困苦。我又怎能唱呢？村中那位名叫Gertrudis 老婆婆的歌，唱得好像天使般悅耳。」

「Gertrudis 沒有想到天主，她的歌唱得太傷感，因為她有殘疾。」

「神父，你不了解印第安人，Gertrudis 雖然不認識天主，但卻屬於天主，不然，是誰賦予她那副可以驅除罪過的歌喉呢？她不但使憂苦者得到安慰，而且令歡悅者深思，除去人血液中的罪污。」

「好了，你這個頑固的老糊塗，我不與你強辯，那個老駝娘有些奇異，令人感到不自在。」

「神父，這就是天主呀！那個老婆婆在她的主人手中受盡苦楚，主人們的天主真是不平等，祂使人不停地受苦，……這個女人

來時患有黃疸病，身體虛弱，……連帽子也沒有；她返去時仍穿著舊衣服，但在她眼中卻有天主。」

「什麼天主？你又怎樣知道？」

「天主是希望、是幸福；天主是生命。當祂來到世上時，既軟弱又頹喪，但祂離去時，既堅定又強壯，一如蒼鷹。祂是真人。天主如今在這裡，在 Lahuaymarca。祂已離開了San Pedro 城，我想祂會一去不返。」

「為什麼？你更不是基督徒。我的孩子，你已經做了那麼多年的聖堂管理員，但你的思想卻像是巫醫。天主是處處都在，無所不在的！」

這位曾擔在 San Pedro城擔任聖堂管理員的混血兒搖頭說：「不！」「這些殺害我們那位無辜的老師Bellido 的人，天主豈能在他們心中？天主會在那些摧毀我們『翠玉山』的工程師身上嗎？難道天主也與那些掠奪別人麥田的政客同在嗎？神父，別令我傷痛流淚，我雖生猶死。我想，天主是與 Don Demetrio同在，當那駝背的老婆婆唱歌時，天主亦與她同在，天主與Don Bruno 身上的惡魔作戰。但我卻很孤獨，無人安慰！」（註一）

從上述這段神父與混血兒管理員的對話中，我們覺察出有不少衝突。他們對誰屬於

教會、天主在那裡、什麼是天主現身的訊號，以及其他許多問題都持有不同的看法。在本文裡，我特別關注的是其中一項：誰有權力和責任代表團體及它的天主出來說話及做事？在基督的教會內，我們以什麼為權威？我們也得承認，在過去廿五年中，我們對權威的默認起了很大的變化，可以說是「模式」的變化。（註二）「模式變化」一詞的意義是說：在重要的日常事件及人生經驗中、在支持推理的前提上、甚至在真與善觀念的基本想像內，有決定性的分別存在。現在先讓我們把發生過的變化描述一下，作為討論教會權威問題的開始。

幾個基本概念的改變

首先，對教會行政人員的看法有了變化：從前看他們的身份（即他們在機構中的地位），如今看他們的神恩（即他們正式辦事時實際表現出的本領，其中不容忽視的一項是能否推動發展團體成員具有的才幹）。此外，對當權者的措施所起的反應也有了變化：從前以效忠機構作為評價（我是不是信異端？我是不是裂教徒？），今日以人際的基礎作為評價（教友的團契可否被提昇成為聖事？）

其次，對官方措施的運作及接受。無論是關於教會領袖或教徒，我們的觀點也有所改變；往時，教會官方的判斷是整個教會必須接受的權威論調；關於那些判斷的內容，行政人員只向天主及上級當局作交代。對教會其他成員而言，接受這些論調是份內的事。（關鍵的問題是：我應否去做？）而現在呢？我們見到有一種趨勢，視這些措施只不過是一種嘗試，藉以勸導教內外的人接受一

些可以改善宗教經驗的價值觀，尤其是與人有關的價值觀。探究當權者的判斷是否符合天主的意願時，主要是要看教會內外的人士贊成與否。（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認為值得做麼？）

第三，教會的當權者從前是以聖統制的模式出現，教會的結構有如金字塔，頂端有天主，隨著層層而下的有教宗、主教、神職人員、修會會士、及平信徒。而現在呢？我們趨向一種對話式的意識，視所有基督徒因著洗禮都可以分享部份天主的權威，而教會領袖的權力來自由天主聖神所形成的教會整體。由是觀之，我們可以覺察，為了解權威所用的主要意像已變了：教會領袖已不再是應受人服從的天主代表或上級當局的代表，而是有責任推行與基督看齊的態度和價值觀的公僕，他們是通過教會向天主作交代。此外，教會職權與天主治權間的關係也改變了：天主的聖意並不純粹直接地傳達給教會的當事人，而是通過在教會內運作的聖神，而天主聖神在教會中的運作是錯綜複雜及多向的（即所謂多元性）。

第四，從前教會的當權者受命行使廣泛的治理權，並在信徒中維持正統的信仰。那時向信徒們要求的是做及說「在主眼中是對的事」。那時教會的權力主要是治理權（上司管下屬的合法權），而服從則在於因襲的奉公守法。今日向教會當權者要求的主要是舉行彌撒聖祭及宣講聖道，使信徒們對個人和集體的罪惡有所感覺，提醒他們有天主的寬恕及悔改的可能。教權首先指的是行使聖事的權力，而服從則表現在個人及團體邁向解放的過程中。

第五，教會從前習慣自視為一自給自足

、人人可見的機構；在這機構裡，一切問題都可以找到答案。如今看來她已自覺是個四面開放、以超形骸為主的人民社團；這種自覺在跟外教人的對話中最易得到發展。這樣一來，中心的意像又改了：教會已不再是分享其創立者的天主性及真實性的血肉軀體；教會是一個旅途中的社團，她的創立者遣發她去跟世界周旋以發現她本身的真正使命。

最後，教會的權威從前被人比作一個固體，一成不變。以往用的意像通常都是物理性和空間性的。如今，教會的權力更好以關係的穩定性來形容；根據這種觀念，權力的路線不斷的在變動但不是亂動，以採用時間性的意像較為適合。

上面的分析看來確有可取之處；我們下面的討論會證實它大體是準確的，不過也有一些不足之處。第一，它假定職權與才能的衝突是宗教特有的事。這是不對的。教會權力的轉型是西方工業社會轉型的一環；職權與神恩的衝突同時滲入跨國公司及各教會。

（註三）第二，上面的分析沒有充分考慮目前轉型的歷史根源。這些根源是深植在今日把權威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如果我們真的要明瞭目前的情況，我們必須探究這些根源。最後，上述的分析並沒有對職權與神恩間的衝突作足夠深入的探討，沒有把衝突中屬於思想的成份與衝突中屬於辯證的部份分開討論。因為對我們該怎樣思想的問題有了衝突，所以才引起上述意見的不同；這兩樣想法的邏輯必須加以仔細審查。是以本文後段將補充上面所作的分析，探察目前轉型的歷史根源，研究對權威的性質引起衝突的邏輯，把職權與神恩間的衝突改名為架構與基層間辯證的關係。

權威轉變模式的歷史根源

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對一般權威、尤其對教會權威深詬苛責的環境裡，這因為我們都是「歐洲啟蒙運動」以後出生的兒女。「成熟的時代」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權威的默認和接受權威的態度。如果我們要了解目前的處境，我們必須認識這種對權威的批判所引起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知道歐洲的啟蒙運動改變了知識的基本定義。知識之成為知識必須經過全面的批判。只有不斷地審查及拋棄那些限制我們思想與行為能力的錯覺，我們才可以超越現階段知識的不足。在啟蒙運動以前，知識是發現，認為被認識的事物本身影響著我們的知識。真知是把外物的規則忠實地向心智反映。這些規則是早已定下的；有些是天主安排了的，有些是與自然或歷史的定律共生共長的。無論如何，所有這些規則都不依賴人的心智存在。做人的使命就是使自身及團體符合這些客觀的規則。那時人人承認，所有為人知道的規則都是在人之外，由超出人控制的能力所制訂的。那時，權威人士之所以能統治是因為他們知道事物的規則。經過三個世紀不斷的探究，我們自己隨意創造了一些不同的規則，而規則帶來的賞罰完全是制度內的事。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由人自己創造和諧及人對自己的事（而不是對那超越我們的力量）負責的世界。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上，人對權威主要關心的，是法律和規則帶來的後果，即我們要訂立什麼行為的準則，使我們能彼此和睦相處，同時又能從制度裡為最多的人獲得最多的利益。

自啟蒙運動以來，我們對倫理行為的觀念也變了。對傳統、傳統的價值、風俗習慣

等的服從早已喪失。唯一能使我們忠心耿耿的是經得起批判驗證的確鑿證據。我們的道德理想人物是實事求是的懷疑論者，凡事窮追極究，而最後的結論是自立自主。從前，倫理是社團倫理，大家認為一起遵守的習俗總是有勝於無。倫理最重要的任務是維護社團的生命。社團的習俗指定什麼是對的行為準則、劃定私有地的界限。那時的人只有兩條路可走：接受規矩或去投奔另一部族。在這類「原始社會」中（這樣的稱呼實在對我們不利），掌有權威的人是創立者及先知（巫士）。前者創造傳統、基本價值觀、和源遠流長的習俗；後者則以大家公認為公正合理的傳統、價值觀、和習俗的名義呼籲社團的人糾正某些弊端。不論掌有權威的人是族長或先知，他們都是神人之間的中介人。他們之所以能施行權威是因為他們能重整上界及人間原有的和諧。他們最重要的信念是：人性的追求不能不承認有超乎個人或團體的東西存在。今日，習俗已不是決定社會倫理的主要因素，而承襲下來的論調可以任人接受或不接受。反之，一個被看作是個好人的大概會認為獨立特行、與眾不同才是真正的倫理行為。倫理的自我意識已成了個人主義化。倫理的權力問題是：我們怎樣能成為有意識的個人而同時又分擔社團的約束與限制？是否一切社會和集體的責任都成為自我的監獄？

最後，啟蒙運動為我們帶來了人生問題的困惑：什麼才確實是真的？什麼對我們的生命、思想、行為有永恆的意義？在宗教方面，任何超性的解說都能合乎我們俗化社會的知識及行為的標準麼？對我們來說，理性有它一套特定客觀的規則及程序。問題是經過細心研究才定出來的，而答案則是把定問

題時出現的各種因素重整起來。一個有理性的人是一個在探索過程中保持旁觀、中立、和講效率的態度的人。一個理想的社會是由一群中立的觀察者管理，他們合力把應做的事做起來。基本的目標及程序的設想應為大家所公認；對它們發起質疑是勢所不容及徒勞無功。工具價值構成所謂理性；大多數個人及社會的問題是關係重新計劃及重新組織的問題。在這樣「有理性」的社會裡，公益事業是靠自動操作及自動分治而完成的。全體是部份的相聚，離合無常，全看性質相近與否而定。在這樣的社會裡，成效的標準有三：（甲）任何事件送達當事人前一律依樣辦理，不管別人的特性及需要（原則上，清官是鐵面無情的）。（乙）對一個官員最高的期望是他（她）在執行職務時能絲毫不滲入個人的情感（情感是主觀的，應留給私人用）。（丙）最少在理論上，一個官員猶如機器的一個齒輪，隨時可以由另一個認識規則及具有相稱能力的人取代。

現在這個「又好又講理性」的社會究竟缺乏什麼呢？缺乏一半我們所謂的生命——像良心、直覺、默契、夢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良知良能。控制著我們的無形之手不僅有亞當·史密斯（譯者註：蘇格蘭經濟學家）的自由市場的理想調整律，而且還有我們對權威的理想看法。人人都知道情感不是客觀的。在一個小鎮報社的台階上嚎哭的人沒有治國的資格。這類的人跟現實脫節。讓他們留在自己家裡哭好了。

顯然的，上面描寫的啟蒙運動對權威的批判未免過份渲染了一點。其實從來未有過一個社會，其中人際的和諧是單靠遵守外面的規則而致的、傳統的風俗是毫無問題地被接受下來的、夢想是被理性化整為零的分析

取代的。我們企圖創造一個美好世界（一個由只對自己及對自己規則負責的人創造出來的世界、一個只靠機械程序生存的世界）的一切努力都因遭到有良知良能的人的反對及冷漠而宣告失敗。無論如何，無可否認，在對權威的批判中有些傾向給我們留下了一些遺產。我們對不是社會創立的規則懷有猜忌，對承襲下來的風俗及觀念持有偏見；此外對情感與情緒等，我們未經證明即已肯定它們不是客觀的。每每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根本盲目見不到分析推理、程序自動化、倫理的個人主義、和我行我素的作風所造成的危險。然而上述的疑心及盲目對我們目前的研究卻有著深重的影響，使得我們很難了解及接受歷史和傳統社會給我們有關權力性質的教訓。它們也防礙基督信徒了解及接受新約所講有關權力的意義，新約是一部出自傳統社會的作品。傳統社會雖然沒有受過色滿·佛洛伊德（譯者註：奧國心理分析學家及精神病學家）的指教也，曉得人的夢想能提供有意義的訊息。我們會在另一篇文章對歷史的教訓作更多的反思。這裡我們只好說，許多有關現代社會權力的問題是過去兩世紀歷史發展的結果。

對權威性質引起衝突的邏輯

在未對有關權力問題的邏輯作反省以前，我們必須注意，我們對知識及理性的觀念一旦有所改變，何以會帶來這麼大的影響。為真正了解權威，必須先知道什麼叫能力，而能力的定義近來有了徹底的改變。能力在過去被認作是能叫別人做我所願做的事，尤其是做那些對我有利而非對他人有利的事。在以往控制私產權或生產方法成為主要能力

關係的社會中，上述有關能力的定義是十分貼切的。在這種情形下，能力的關係是靠管理使用工具的規則來釐定。但在現代社會中，能力關係的重點越來越趨向於控制資訊的流動。能力越來越能叫他人去想我願他們想的事，特別是去想那些對我有利的事，千萬不要去想那些對他們自身不利的事。今日，能力大致是用於塑造下屬的知覺、認知、和願望。使下屬忠心接受現狀的一般方法是：使他們相信沒有別的出路，或現時的秩序是出自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再或事情的發生是由天主安排、對人是有利的。若我們想知道誰在我們今天的機構裡當權，我們就得去問，誰可以對這事提出議程作討論（註五）。

權威與神恩之間的衝突可以借它們辯論的邏輯來說明。當權的人平常設想任何組織的任務都可分成無數份，可以視為彼此無關，互不相屬；有才能的人卻認為任務是靠互相溝通聯絡才組織起來的，分工的標準要看任務的性質及任務進行的階段而定。（註六）在前者看來，所有的人都是制度裡互不相干的單位；在後者看來，個人是獨特的，個人間的關係只因環境而造成。此外，當權的人認為組織中的個人最好是依照等級來分配，最妥善的組織是能把策劃寫在紙上的組織。有才能的人卻聲稱策劃常是照目前的任務及加班而定的；要求把所有的策劃寫在紙上猶如把「亂世佳人」這部電影改成一堆不動的照片，那有會不失藝術之真的呢？當權的人主張組織中唯一有意義的關係是上司與下屬的關係，至於個人之間如何平等相待則是個內部性的問題，不然，就是無關宏旨的問題。有才能的人不認為有清一色的關係。領袖的出現是根據任務的需求。政策有時是大家一起來定的，有時則交給一些人去定，這

是因為只有他們才有這樣的才能，或是因為社團的人授權他們這樣做。決策權及執行權不是永久屬於社團中某一個人或身份。當權的人常常關心劃分界限：社團與社團間的界限、個人與社團間的界限。因此，定義的角色就非同小可了。最重要的是把我們是誰、我們與別人有什麼不同、我們每一個人如何配合整個體系等問題一一規劃出來。奇怪的是，為維持這類的界限和定位似乎又不得不有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人高高在上。有才能的人認定界限是因特殊目標而設的，目標有所改變時，界限也隨之而變。此外，他們指出，正式的界限往往跟現實的情況不符。他們說，實際上，許多社團本身每每重疊，個人及個人的特長不能像當權者所想的這麼容易被分辨出來。唯一被有才能的人承認的界限是由任務的策劃、地理或交通的特殊情形所造成的。在這些事例中，界限所涉及的是個別事件的本性而非一般事物的本性。（註七）

對社會和對社會機構的看法，有人喜歡當權者的看法，有人喜歡神恩者的看法，全看個人的口味而定。如果一個人喜歡安定、清晰、秩序、個人身份感，他會贊同前者的看法。反之，一個重視應變、進步、個人獨特感、及事物多元性的人，自會支持後者的看法。不論口味如何，重要的是承認這兩種看法為構成一個良好的社會同樣是必要的。兩種看法的邏輯都是對的；它們兩者都對，只不過要互相琢磨、截長補短。當權者的邏輯或神恩者的邏輯單獨得勢時，結果便有獨裁思想的產生。下面我們把獨裁及辯證（對話）的邏輯分別提出來，相信對大家都有益處。

獨裁思想的邏輯把人看成極端——或好或壞，而不會把人看成善惡相混。好人有好人的特色，惡人有惡人的特色。此外，好人「只」有好的特色，惡人「只」有惡的特色。這些特色是不會變的，是可以確切地被認出來的。如果一個人同時有好與壞的特色顯現出來，那麼有兩個可能：好的是假好的，或者壞的是假壞的。這裡有一耐人尋味的判別準則：因為認壞人做好人所要付的代價遠遠超過認好人做壞人，所以當有懷疑時，就先把人當壞人看待。獨裁的邏輯有遠不可及的目標和高不可攀的要求。目標是一個極善的世界，需要的是絕對的定論。但它們也不是辯證的材料，因為學理常比反證的形象強，難明的資料只要依學理調整便可以為人了解。（註八）

乍看起來，當權者的看法比才智者的看法更閉成為獨裁主義的支柱；一般而言，歷史證明了這一觀點。才智者在歷史過程中所面對的危險更為嚴重，但只是曇花一現而已。才智者的發展偶然也會造成獨裁主義，對他們來說，真理的定義是人人都作如是想，歐洲中古世紀的「千禧年主義」就是一個實例。神恩者的社團慧眼獨具，異於一般愚昧的凡夫俗子。他們自認是未來的先鋒，只有他們能預見未來。

辯證（對話）的邏輯有五特色：（甲）它承認開始研究時出現的問題是由研究者本人的假設及由研究者與其周遭的人的共識所造成的。研究一方面塑造，另一方面也發現我們獲得的知識。探求真理就是建立符合主題的學理及修正個人及社會偏激的假設。（乙）辯證邏輯認定真實是動的，不是靜的。把現實描寫成靜止的或不變的是歪曲了它。

定性固然可以在現實中被發現，但為時並不久，現實是不定形的複雜物。（丙）現實是善惡交雜的。因此，現實是兩種矛盾力量的時合時離。這條公理對認識學尤其對研究史學相當重要，辯證邏輯預料善在成立時同時會造出它在學理上排斥的惡來。（丁）事物喜實的本質是矛盾的關係而非不變的定則，當我們深究出我們個人及集體習慣加給現實的曲解時，我們就能發現事物的本質了。分辨事物真正的本質的開步功夫就是把束縛社會我們的錯覺辨認出來而加以分析。（戊）認識事物真正的原因要靠類推的方法，但類推每每是曖昧的。我們必須用類推、比喻、借意來講話，因為描述本質就是為具體歷史的現實作分析。辯證邏輯的言語每每是曖昧的，因為它企圖抓著現實的基本組合——正面與反面的結構。（註九）辯證邏輯不拒絕清晰及明確的理念，它只把它們二者的功能相對化而已。辯證邏輯探究的目標，最好用 Wittgenstein 的話來描寫：「最難做的是把這無限性絲毫不爽地用言語表達出來。」（註十）

基層及架構的辯證關係

在本文開始時，我們把教會權威的問題描寫成職權與神恩之間的衝突。根據前節所說的，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架構與反架構的衝突。至於筆者本人喜歡用的名詞則是架構及基層。

基層社團是由平等身份的人組成的社團，初創期的社團都是如此。對基層社團的人而言，社團是此時此地演進中的。基層社團的人強調個人關係的重要。他們推行自動自發性——即那使我們與我們本性接觸的人生德性。他們的組織是四面開放的。他們的

言語充滿喻意，富於情感。對他們來說，天主是從自身內原有的潛力塑造出世界的藝術家。

架構社團是由不平等身份的人組成的社團。正常期的社團都是如此。對架構社團的人而言，社團是一個等級分明的體系，社團裡的人依照每人才幹的「多少」而被定位。架構社團的人強調社會責任及限制自動自發的需要。沒有他們，我們就永遠不會動員所有力量為達到社團的目的；社團將會變成一團糟。他們的組織全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他們用的是智性的話。他們的天主無論對過去、現在、或將來都是有計劃的。（註十一）

如果基層人士不受架構的限制能有機會建立團體的話，則他們和他們志同道合的人平常會經過一段時間團結在一起，但初時的興奮過後，結果是成立架構或趨於消滅。除非有一個像千禧年主義者的烏托邦型人物出來把握住整個社團，否則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假如有這類型人物出現，那麼未來的號召也許能把他們團結在一起；但這一號召，如果沒有架構的支持，往往連把創會的本旨也毀掉。那時他們已不再是以平等人身份相待的、視人類為本性的社團；他們一變成為自命不凡、自以為只有他們能看見盛世的出現、能知道什麼是對未來有利的倫理行為。他們判斷所有社團外的人。他們麟標幟變成了假面具，把他們對架構理想的不忠不實掩蓋起來。在倫理方面，只要社團內的人認為對未來有利的，就什麼都可以——包括那些歷史訓示我們會貶低人格的事。

如果架構得以取代所有自動自發的行為，社團會變成法治主義的集會，而法治主義會把所有架構全部毀滅，因為法治主義把人性一切的差別毫不客氣地予以夷平。傳統不

再是社團生活的嚮導。法律成為一套指定的規則，擁立著一個要我們做某制度的機械人的神。過去被弄成有最壞意義的神話，講的不是開天闢地的故事（因為這種故事是不能以明文哲理講的），而是妙想天開的原始時代，把目前架構的主要輪廓都放了進去。結果是不肯承認過去的男女跟我們有分別。法治主義生活在永遠輪迴的神話中，認為世界從來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有偶然的事發生。除了對某些人可以容許出規外，法規是可以抵觸的——這條原則沒有確實穩固的基礎。

從保祿宗徒寫的第一封書信、也就是一個地方教會所保存的第一封書信看來，最初的基督信徒把基督的教會建於架構上。但每次當他們重新舉行感恩祭及宣講聖道時，他們會回想到他們基層的本質。耶穌基督的教會是一個以經典滲入禮儀的社團，一個舉行祭祀及宏揚聖道的社團，那就是說，架構及基層兼而有之。這兩者的對立，無論稱它為職權對神恩也好，或架構對反架構也好，就教會為人間組織的層面來看，都具有深遠的意義。本文的主題——職權與神恩的衝突——最好以架構及基層的辯證關係來了解它；這種對立的關係必須維持及推行，這樣，教會才能繼續成為耶穌基督的淨配，才能繼續把創造及生養我們的天主揭示出來。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刻劃出永久有關權威的問題，那就是：基層與架構對社團的態度的辯證對立（或平衡）。如今在結論時，我們最少還得注意四項與分析今天教會權威問題有關的事。

第一，如前所說，在過去兩個多世紀，世人對一般權威不斷的作出批判，而每每又

是毫不留情的批判。一方面，啟蒙運動聲稱權威與真知作對，因為權威的基礎僅是信仰及意見而已。權威可能有時有它的作用：父母有權管理自己的子女看來是對的；官吏應當有權處理罪犯；但權威對成熟及負責的人實在不相稱。這輩人會質問一般傳統公認的道理，他們靠經驗來建立他們的知識。另一方面，浪漫主義及最近出現的新左傾潮流也拒絕接受權威，認為它必然相反真正自由的自然自發性。權威勢必限制自由無拘無束的表現，因此而防礙個人完全的發展及防礙團體認出共同的心意來。

兩方面的批判都設想權威常是僵化的、食古不化的。當權者賴以為生的是民眾的迷信及恐懼。所有的當權者都施行壓榨及操縱的技倆。他們的任務是使「未經洗腦的老百姓」相信公益就是傳統過時的特權階級的利益。

這兩百年來批判的結果是：一般人的思想很自然地對所有當權者（包括教會的當權者）及對他們職權的行使都懷有疑忌。當權者及他們的作為每每未經合理的審查就受到非議。有鑑於這種持續而苛刻的批判，一個對現代化十分機警有名的分析家不禁揚言，權威已不屬於我們時代的觀念了。（註十二）

第二，本世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每次大戰後，我們體驗到文化界價值觀的崩潰。過去數世紀，這種價值觀使西方國家（以及被西方國家管轄的其他地區）聯成一氣，如今看來，這已是過去的事了。政治的對立似乎更厲害了；倫理問題的多元化成了日常之事；人對各種思潮的效忠及認同正在劇變中。使羅馬天主教會連結一起的價值觀，特別在梵二以後，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在這方

面，教會之深受影響並不使我們驚奇。當文化價值受到非議時，首當其衝者自然是那些肩負文化價值的機構。諸如學校、教會等都是以最嚴格的標準來被審查，結果都不合乎標準。

第三，人民期望國家給他們經濟及軍事的保障。我們每天看的報紙在在顯示國家對一國的經濟有很少控制的可能。一般而言，銀行業、工業、商業已是國際性的；即使這些行業以某一國為基地，它們的活動每每與母國的利益背道而馳。試想，今日一國的預算赤字會帶來多方面的後果，跟國際間美元的流入或流出有密切的關係。更嚴重的是原子彈的問題。今天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給她的國民軍事安全的保障。她可能給的保證是恐怖的均勢，就是說：雖然我們不能保護我們的國民免受嚴重的傷害，但我們可以加給他們的國民同等或更大的傷害。（註十三）因為國家實在不能像過去一樣給予國民經濟或軍事的保障，國民對國家的效忠自然也減少了。一般機構及管理機構的官員都不是在真空裡運作的。對教會機構及官員信心的動搖少不了會影響到其他的組織。這樣一來，那

些對金錢、對領土焦慮的人終於把他們的視線轉移到教會身上，看看教會能否使他們獲得天主的保障。

最後，目前世界轉變的步伐大大增加，為前世紀所無法想像的。今日的父母在教育子女的任務上與電視平分秋色（世界因此大為展開）。當子女長大後，父母的價值每每跟子女們的同輩及搖滾樂的明星來作比較。子女們又多次有旅遊的機會（跟或不跟父母在一起），這原是本世紀初超級富家的特權。所有這些由工業技術引起的變化及這些變化所帶給教育子女的影響，我們都不能忽視，因為教會常常期待父母們把她所珍重的宗教價值傳授給他們的子女。當數種不同的力量爭著去教育一個人時，每一種力量的影響就相形見绌了。（註十四）在我們多元化的環境裡，父母的權威及教會自認為有的宗教教育權都不能像過去一樣毫無疑問地影響今日的青少年。是以，我們只能預測來日的宗教權威勢必意識到那支持宗教權威的輿論會逐漸縮小，而宗教權威的一切措施會越來越遭人議論。